

## 「無用之民」有礙觀瞻

Zwia Lipkin, *Useless to the State: "Social Problems"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ist Nanjing, 1927-1937.*

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06. 420pp.

江勇振\*

Zwia Lipkin 這本書，從「無用之民」(useless to the state)這個主標題來看，似乎屬於「黎民研究」(subaltern studies)的範疇；然而，主標題裡既有「國家」，副標題裡又有「社會工程」(social engineering)的字眼，看起來似乎又像是「國權伸張」(state-making)研究的範疇。事實上，兩者皆不是。本書既不是「黎民研究」，也不是「國權伸張」的研究，而是介於兩者之間。本書的索引裡，既沒有「黎民」，也沒有「國家」這一條目。如果我們再瀏覽一下索引，將會發現其屬於觀念型的條目只有下列三個：「偏差行為」(deviance)、「社會達爾文主義」、以及「社會工程」。同時，這三條目也只各佔寥寥幾頁。筆者指出這幾點，主要不在於批評本書不夠理論，而是要強調本書的主旨非常明確，作者既不好高騖遠，也不作驚人之論，她的目的就在老老實實地處理難民、貧民窟、洋車夫、妓女、以及乞丐等問題，以呈現南京政府向現代政權邁進的軌跡。作者最成功的地方，在於先大略地勾勒出中、西歐國家的經驗，然後把南京政府的舉措放在這個大背景下來分析。

作者在〈導論〉裡，用兩個金陵大學西洋教授的小故事，來說明中國的

---

\* 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大學(DePauw University)歷史系教授

變遷。第一個故事發生在 1911 年，有一位金大農科教授帶學生去參觀貧民窟。其中一個學生很感激，說他不知道自己的社會裡，居然會有人過那樣的生活，反而要讓一個外國人帶他去看才知道。第二個故事發生在 1930 年，另外一個金大的教授放了兩部紀錄片，拍的都是中國窮困的景象。學生看了以後，認為是在侮辱中國，要求學校把該教授解僱。爲了要解釋爲什麼這兩個小故事的結局會有那麼的不同，作者先介紹了西歐城市建設興起的概念，以及對貧民窟、無業遊民的處理模式，再談到南京政府定都南京，想要刷新首都形象，一新外人對中國印象的企圖。在這種心態之下，中國的政府跟人民很自然不願意讓外人看到中國窮困的景象。

第一章〈新首都的新社會〉，略述了民國時期南京市的发展，到 1927 年 4 月，國民黨定都南京。定都初期，理想和實際之間的落差極大，市政府缺乏財源，一直要到 1929 年 12 月，才擬定了一個首都建設的五年計畫。由於物質建設慢了好幾拍，於是南京市政府提倡精神建設，希望用看起來似乎不需要什麼花費的精神建設來補足。1928 年，第一次人口普查顯示貧民數目的龐大，如何製造就業機會，就便成了當務之急。1934 年 3 月，蔣介石發起了「新生活運動」以後，南京市推動了「除三惡」的運動：鴉片、賭博、娼妓。到 1937 年，南京慶祝建都十年的時候，雖然南京距離首都的理想還有一大段距離，但是成績已經相當可觀。城北原先一片荒蕪，已經開始佈滿樓宇與民房；城南的建設也大有進步，包括電力的供應在內。南京的人口在十年間增加了三倍，教育設施、醫院、街道建設也都頗有成績。雖然 1937 年日本的侵略終止了南京的建設，但是南京政府所奠定的現代化的基礎，已經讓中國的現代化走上了不歸路。

第二章〈難民〉。在中國歷史上，難民的流離是司空見慣的情事。南京成爲首都以後，就變成了災民逃難的目的地。第一批兩千人的災民在 1928 年冬天到來，作爲首都，南京不能見死不救。然而災民繼續不斷地到達，到 11 月底，湧入南京的災民已經超過了十一批（作者沒有說明人數）。窮於應付

的南京於次年初開始遣返災民。南京除了要求中央政府命令各災區就地賑濟之外，不得讓災民到處流竄。然而，1931年夏天，淮河、長江的水災，又迫使大批的災民流亡到南京。南京除了設法阻止災民進城以外，也透過電報要求各地鐵路部門阻擋災民，不讓他們搭火車到南京。但是天災人禍繼續到來，除了每年週而復始的災民潮以外，1932年1月日軍在上海的攻擊行動，也帶來了新的災民。總之，南京沒有工業，無法吸納缺乏技能的勞工。即使南京政府努力阻擋，災民仍然一再湧入。於是南京也就一直無法解決有礙觀瞻的貧民問題。

第三章〈貧民窟〉。貧民窟的形成是人口大量增長的結果，其中最大因素，當然是難民。由於有礙觀瞻，南京政府一直想要徹底解決貧民窟的問題；不過，大批建造平民住宅不是政府財力所能承擔。更嚴重的是，即使南京政府陸續蓋了一些平民住宅，廉價租給貧民，卻又乏人問津，問題就在於平民住宅蓋在偏遠的地區，與貧民工作的地點相隔太遠。1934年底，南京政府開始比較有計畫地蓋首都平民住宅區以及勞工住宅區。然而，除了財力有限以外，持續的天災人禍也在在影響了政府建設的能力。比較可行的做法，是設法讓貧民在他們所住的棚戶區，就地從事改善其住宅環境。作者在貧民窟這一章中，把南京政府掃蕩貧民窟的努力，放在西歐國家現代化過程類似的歷史經驗的脈絡下來分析，很能幫助了解。此外，這也是唯一一章讓讀者聽到「黎民回嘴」(The subaltern talks back)。例如，中央大學附近面臨被拆命運的棚民，集結起來作自救的活動，用孫中山「民生主義」作為他們的抗爭口號，亦即用國民黨總理的話向國民政府請願。雖然我們不知道這些棚民抗爭的結果如何，但是作者說這個案子因此而擱延。

第四章〈黃包車夫〉。黃包車成為中國近代化的一個寫照。十九世紀末，當黃包車從日本傳進中國的時候，人們覺得比轎子要舒適、也快多了。但五四運動以後，黃包車成了各種社會問題的表徵。黃包車夫既惹人厭，又讓人生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成為中國民族落後、野蠻的象徵。南京政府有心淘

汰黃包車，可是又害怕他們人數眾多，轉業不易，會造成社會問題。於是，只好從治標的方面著手。爲了避免黃包車夫討價還價，或者欺騙外地遊客，政府訂下統一的車資。同時，爲了觀瞻，又規定車夫必須穿制服、注意儀容。在另一方面，爲了照顧車夫，讓他們免於被車行剝削，南京政府也試圖訂下租車費，組織合作社，甚至還要求南京的公車調高車票價，以免跟黃包車夫搶生意。一直要到中日戰爭前夕，南京政府才真正開始考慮淘汰黃包車，讓市民用現代的交通工具來代步。

第五章〈娼妓〉。娼妓一直存在中國社會，其之所以成爲「問題」，又和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期望有關。南京的秦淮河畔在歷史上就是青樓區。南京政府在一開始的時候，對娼妓並不禁止，反而是向她們徵稅，是南京政府稅收的大宗之一。以 1927 年爲例，娼妓稅佔該年所有娛樂稅的 95.6%，全市稅收的 12%。然而，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之下，娼妓很快地就成爲討伐的對象。1928 年，南京開始禁娼。然而，南京政府禁娼的政策完全不成功。貧窮、天災是娼妓的來源。在禁娼的政策之下，原來集中在下關、夫子廟的娼妓，四散於南京各地。於是，取消禁娼之議迭起，正反雙方爭執不下。1934 年，蔣介石推動新生活運動，基本上是站在禁娼的立場；然而，南京政府終究沒有找到解決娼妓之道。

第六章〈乞丐〉。跟娼妓一樣，乞丐之所以成爲社會問題，是和現代化有關的。本書作者先討論傳統對乞丐容忍的態度，然後和近代西方國家視之爲偏差行爲的態度相對比。南京政府對乞丐的政策，完全是來自西方的產物。由於南京政府覺得乞丐的存在有礙觀瞻，特別是乞丐會去外人遊覽的地方乞討，例如明陵和中山陵，就開始把乞丐收容到「遊民習藝所」裡。要乞丐習藝，其所代表的就是一種新的觀念，要把他們從「國家無用之人」，改造成「有用之才」。整個南京政府時期乞丐政策的演變，就是從收容、遣返、演進到改造的過程。由於災民持續地湧入南京，乞丐的來源不斷。南京政府除了建造留養所來收容老弱的乞丐以外，開始用年輕力壯的乞丐——「閒費人

力」——從事各種市政建設的工作，一方面讓他們用工作換取伙食費和生活費，另一方面讓他們養成「服務精神」。於是，從來就沒有把乞丐清除掉的南京，到了 1937 年的時候，市長馬超俊可以驕傲地宣稱，南京的街頭已經沒有乞丐的蹤跡了。

最後一章〈尾聲〉。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首都是北京，本書把分析的焦點轉移到了北京，在毛澤東時期，所有讓南京政府頭痛的社會問題都獲得了解決。改革開放以後，許多社會問題重新出現，例如，民工、娼妓、乞丐。連續性是本書在「尾聲」裡討論的主軸。南京政府所用的觀念、辭彙和政策，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用。為了準備 2008 年的奧運，北京大力美化北京。所有有礙觀瞻的人與物，都是掃蕩的對象。作者說當今西方人權機構譴責中國處置「偏差行為」分子的方式，然而這些處置方式其實都是源自西方。她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諷刺，就在中國學會了西方的做法，自以為應該受到褒揚的時候，西方本身卻又改變了，於是，中國所得到的只是輕蔑和譴責。

這本書的優點在於它主旨單一而明確，亦即流離、貧民窟、娼妓、乞食等等行為一直存在於中國社會，被接納、容忍著，它們之所以會在中國成為「偏差的行為」，是中國走向現代化，向西方看齊，用西方的觀念、政策來對付這些人的結果。而這個現代化的追求，就體現在南京政府對首都的建設之上，特別是試圖解決難民、貧民窟、洋車夫、妓女、以及乞丐等等社會問題之上。由於主旨單一而明確，本書的分析及其結論都恰到好處。然而，本書的優點也正是它缺點的所在，由於主旨過分單一，甚至狹窄，分析與結論也有其侷限。一如我們在文章一開始就指出的，本書既不是「黎民研究」，也不是「國權伸張」的研究，而是介於兩者之間。這個介於兩者之間，就是本書缺點的癥結所在。這也就是說，兩者的討論都不夠深入。本書的副標題裡有「社會問題」這個字眼。然而，本書所處理的，與其說是上述這些社會問題，不如說是要從這些問題來看南京政府的治理方式。因此，本書對於難

民、貧民窟、洋車夫、妓女、以及乞丐問題的處理傾向於浮光掠影。同樣的，本書的副標題裡雖然有「社會工程」這個字眼。然而，本書所處理的與其說是社會工程，不如說是南京政府對上述那些社會問題的因應政策。這些政策多半都是消極、被動的，談不上有「社會工程」的意義。

本書的〈尾聲〉也在在地彰顯出本書既不是「黎民研究」，也不是「國權伸張」的研究。本書所討論的是南京，而〈尾聲〉所討論的卻是北京。換句話說，本書作者的興趣所在，不但不是「黎民研究」，不是「國權伸張」，更不是南京。她所要呈現的，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政府如何在西方現代化理念、政策的影響之下，把傳統中國社會所容忍、接納的邊緣分子，負面地看成是「無用之民」。這些「無用之民」必須掃蕩，因為他們有礙觀瞻，容易落入讓外人嘲笑中國落後的口實。在積極方面，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角度來看，這些「無用之民」還必須接受改造，以便讓他們能成為社會上的「有用之才」。如此簡單的主旨固然使本書條理井然，然其缺點卻使本書無論在理論上或資料上來說，都有欠深入，同時也因而減低了其引用的價值。幸而本書的「附錄」裡有一些有關貧民窟和黃包車夫的統計數字，對南京政府時期的社會問題多少提供了一些具體的資料。最後，本書沒有中英人名、名詞對照表，使用起來稍有不便。此外，孫中山的「總理」之稱，本書一再翻成 president（總統），乍讀之下，頗令人不解。